

国际倒爷实录

● 黑马 著



国际倒爷实录

● 黑马 著

(吉) 新登字05号

国际倒爷实录

GUOJIDAORYESHILU

毕冰宾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0册 定价：3.20元

目 录

青春岁月里的偶然——代序	毕冰宾 (1)
傻子出国记——一个中国青年在(前)苏联	(4)
“东方快车”上的国际倒爷们	(19)
“东方快车”从黑市出发	(38)
“东方快车”黑市票最新动向	(46)
中国倒爷在(前)苏联	(54)
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东方快车记事	(76)
那五那六那七那八——中国老少爷们儿在西德	(96)
签证, 留美签证! ——来自美国使馆门口的报告	(109)
1991, 奔英国的人们	(118)
奔加拿大最合算! ——形形色色“洋插队”	(128)
西澳大利亚, 天涯海角	(145)
澳大利亚“开拓者村”	(150)

东京城中的“儿童城”	(153)
从东京到北京	(156)
慕尼黑，田园都市	(160)
古堡中的“小联合国”	(164)

青春岁月里的偶然

—— 代序

毕冰宾

本是一个纯纯洁洁的学生娃，毕业后仍然纯纯洁洁地扎在象牙塔中做着学术论文，译着文学名著，甚至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更为纯洁无比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坐上北京——莫斯科——柏林的火车去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研修一个月。就在这趟横穿蒙古、西伯利亚和波兰的火车上，我结识了一批自费留学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中国学生、讲师、歌唱家等老老少少一群人，我们在那六天漫长的旅途中真正过上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日子，像一群孩子日日夜夜狂欢，像一群没有国籍的“地球村”民一样话题闪烁、肆无忌惮地东拉西扯，像一群浪人手提北京老白干身着花花绿绿的牛仔装在莫斯科大街上边舞边走边唱，向肚皮开始紧缩的前苏联人展示着我们中国人在下水肥起来后精神上的飞扬，最终像一群乞丐舍不得花袋中可怜的几个马克住旅馆过夜而在寒风中扎电话亭、跑步取暖迎来了柏林的黎明，一个个随之鸟兽散去，长亭短亭泪眼相送各自奔向自己锁链之舞的沉重人生……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并不冷静，我被很感情地拖入了一场人生戏剧的表演——当然是客串，

但仅仅这场六天的客串已让我心肝俱颤，不禁进入角色，假戏真做了一回。我相信，那几天内，我与他们心心相映，因为那几天我们是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真空中，人人变得很透明——或许也因为人人都知道不会再相逢。客串这场戏，我真正将自我与作为观众的第二自我融为了一体。于是在慕尼黑的二十几天中，每天夜深人静只有我一人独与孤灯相伴时，我便激动得不能自己，反反复复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闪回那六个难以忘怀的日夜，连每个人说话的神态和口音都是那么清晰。于是，一股冲动激荡起我并不年轻的热血，我竟鬼使神差地落笔写下“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几个字，随后文字如落瀑一泻而就。亏得那是在三十岁以前，情感并未全然干涸。

回国后我把这平生第一篇大特写交给了《追求》杂志的编辑霍刚，他看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他看到最后几乎要哭出来，表示一定争取给我发表。那是1988年5月。

从此我就成了客串记者，进入不少并不纯洁的领域采访。报刊界的朋友们突然发现我这个象牙塔中的伪学究还会写点受读者欢迎的活生生的文字，就出题目。定采访内容地鞭策起来，我不得不努力客串，以不让朋友失望。

收进这个集子中的文章所以能写就，多半是《追求》、《大学生》、《文化春秋》（已停刊）、《中国青年》、《黄金时代》和《时代青年》杂志社朋友们“导演”的结果，我只是个较好的性格演员而已。为此十分感谢他们，特别是霍刚这位敬业精神十足的编辑。

《文汇报》和《新闻出版报》同仁的二手传播，很

为拙文添了声势。拙作最终引起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胡卓识女士的注意。胡女士终于促成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实在令我这半路闯进记者行列中的伪学究感到半分“成才”的自豪。

个人得失并非我的终极关切，关键的是我自信：这些朋友们没有看错人，我的文章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也为广大读者乐读，发表后几乎篇篇被转载。我是以业余身份但是专业精神负责地采写这些文章的，不是做学问搞翻译之余随便写来贴补生活的。我把写这种特写看得与我的学阀一样重要。

当然最终的评判人是读者，他们的喜厌可以是对以上几家报刊对我任用之是非的试金石。文章结集出版，可集中供读者评判。但我自信，谁买了这本书都不会白买，一个学究客串记者的文字别有一番风味。你不仅自己读，还会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读。我们会因为这本书而成为朋友。

1992年7月7日北京莲花河畔

傻子出国记

——一个中国青年在（前）苏联

这是我童年时听说的第一个外国。它的语言中那个大舌颤音极其迷人、极其启发人的想像力，有时一句极长极长的包括了二三个这样颤抖的音节的“话”竟是一个单词“无产阶级”。一句“亲爱的同志，您好”非得让你的舌头打上几个弯儿、颤个不断，听上去着实觉得那句问候发自肺腑，真诚，热得很。后来，我别无选择地一本一本地读翻译过来的苏俄名著和儿童读物，不知不觉中对这块土地着了迷（尽管那时说他们“修”了，两国有时还动枪动炮）。

上中学后，我也着迷似地学起了俄语。为此我极受俄语老师青睐。可是，77年的高考却让我别无选择地进了英语系。学英语当然实惠得多，可是把俄语扔了心里总不是滋味。

学外语的人都爱犯一种廉价的国际主义病。我们学会了（半瓶醋或只一个醋底）一种语言，就自以为又认了一门亲戚，甚至跟又找了一个老婆差不多。见了那个国家人就觉着挺亲切，愣要跟人家友好。反过来也一样，他们一听你努力地练他们国家的语言，忽觉有朋自远方来。于是都不亦乐乎起来。

此时，柏林——莫斯科火车就要进入边境城市布列斯特。

因为我的俄语是个“醋底儿”水平，我只好填写英文的报税单和入境单之类的手续。

这时，边防海关人员中站出一个女的，用带着只有一丁点俄语腔的英语问我：“你讲英语？”表情极审慎。我忙表白我俄语不行，尽管我喜欢讲。随后我讲了几句俄语。“中国人”，他们笑了。

填好报税单，他们要数一下我随身携带的美元。因是公款，我怕被偷（中国人在外国常被当成日本人被偷，因为人们都知道日本人是世界首富），把那几百块分成二三堆细细收藏。有一堆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这样我的实际数目与税单上的数目不符，少了百八十块。按规定应该减少税单上的数目。可一旦什么时候（如再出境时）那百八十块找到了，我的实际拥有美元数就会比税单上多，查出来就得全部没收（苏联的外汇管理极严）。我急了，表示翻箱倒柜也要找出那百八十块来。他们见我如此真诚，挥挥手，算了，还填原先的数目。

他们知道中国的出国人员守法，也信任中国人。而对西方人可不客气，不仅要翻一翻，有时还要把车厢顶上的天花板拆开来看看才罢休。当然是什么有害物也发现不了。西方人只能嘲弄地耸耸肩、摊摊手冲我们笑笑：“真没辙！”这时我会说：“他们也没别的意思，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其实我这是在为他们解围。似乎是自己的一位朋友对另一位朋友做了点冒犯的事，我两边都不愿得罪，又不愿明显地同情哪一个。一路上凡是碰上这样“需要我”必须表态时，我都是这

样不冷不热地来一句什么。

车上有一位友好国家的官员，他死活也不同意车上的西方男女说一句话，只跟中国人说话，他看不惯他们，讨厌他们。“党性”极强。后来我和西方人多聊些，他就很愤愤然，罚我替他倒垃圾，他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共青团员，党指挥团”。让我哭笑不得。但我仍旧和西方人挺热火，他干脆一个人生闷气。我只好讲大道理：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区分开来云云。心中不免感叹自己骑墙的功夫。什么时候中庸之道这传统文化早已渗入我的骨髓？我还自以为自己是个性愤世嫉俗者。

后来他让我看他那八百美元一套的西装，得意地夸美国衣服如何如何精神，在美国工作时他如何如何享福，我方知道自己太上当。他不理西方人是出于谨慎，怕出问题回去交待不了，掉乌纱帽，其实他心里着实崇拜西方。所以，后来车上的中国人都不再理他。在莫斯科下车时也没跟他“拜拜”一下。

中国人有时老想做老好人，反倒难交真正的朋友。弄不好还会落个自嘲下场。

但不管怎么说，我遇上了对我不错的苏联人。这使我想起在东柏林转车时的情景。

那天我从慕尼黑坐车到东柏林，同包厢中有几位东德人。我试图用英语同他们交谈，他们表示英语不懂。所以一路上我们没交谈。快到西柏林时我用俄语结结巴巴地问从东柏林到莫斯科的车什么时候发车，是否在柏林总站发。他们马上反问：“你去柏林？再去莫斯科？”用的是英语。我点点头。于

是他们很热情地，用较流利的英语说：“是同志。”然后告诉我，不必到东柏林转来转去，就在西柏林下车，不用出站即可转上去莫斯科的车。说话间车进了西柏林站，他们又七手八脚地帮我把行李运下火车。面对这么热情的“同志”，我终于说：“同志，十分感谢！”同志这个词我有十来年不用了，觉得说出来极别扭。在国内我早已习惯了见人必称“师傅”。亏得那一刻不能说中文，否则我又会脱口而出“师傅”的。

可惜我上的这趟车是去列宁格勒的。女列车员极热情地说：“没关系，反正这是我们的车，能把你一直接到苏联，你不用再在这里等下去了。”随后她又帮我打听，说二小时后有一趟直达莫斯科的车，最好还是坐那一趟，省得到布列斯特再换车。

就是在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帮助下我在深更半夜顺利地转上了去莫斯科的车，为此我更渴望早一点进苏联。那里的“同志”一定会更多。那个国家一定会很美、很文明，就像我碰到的这些人，就像我从画报上看到过的那样。

布列斯特是一座历史名城，不仅仅因为著名的《布列斯特条约》，还因为著名的布列斯特保卫战使它出了名。记得读《布列斯特要塞》这部报告文学时，我曾为这座边城军民的浴血奋战场面所激动，彻夜未眠。那是在德国法西斯已逼近莫斯科城，莫斯科以西的国土都已沦丧，布列斯特早已变成一个孤岛的情况下苏联军民仍在坚守着每一寸焦土！布列斯特，血红血红的城！我怀着景仰走近你。从柏林到布列斯特原来是这么近，等于从北京到南京，中间却穿越了整个波兰。

这里的车站是自由进出的，火车要在这里换轨，一停就

是几个小时。我借此机会上街走走。

一切都是宁静的，没有喧哗，没有都市的热闹，车站似乎离市里还有一段距离。车站附近的这条街极平常，房子很旧，街道不那么平整，一场春雨哗哗落下，街上的坑洼中积了水。这里的车站不像西德的车站那么明净，光线暗淡，气味不够好，总之这里让人想起一座忙乱的小集市，比较脏乱。

我有些失望。登上高高的一座土坡，任四月的野风吹着我，任丝丝细雨淋湿我的回忆。我只能回忆从书上知道的它的英雄的过去，而不愿看眼前的这一切。不错，它并不太糟，可它不应该是这样。我原先对布列斯特怀着极深的感情和热望，把她想得极美极好。

这是一座边城，或许边城可以差一些。我这样对自己说。

列车刚一启动，我这个包厢中就涌进二女一男。车厢走廊上乱哄哄挤成一片，同我们国内的火车没什么两样。大包小裹，竹篮子、大布袋比比皆是，人们的穿着显得朴实极了，使我大有在国内乘车之错觉。

这三个乘客倒是很友好，他们坚持不坐我的卧铺而宁肯三人挤在对面的铺位上。其中二个中年人体态胖大。我很看下去：请他们坐过来一人，但他们执意不肯，说：“那是你的铺位。”

我想那漂亮的女性塔玛拉一定是大学生出身，我试图讲英语，可她说她只会德语。另一中年大婶模样的人我料定她文化水平不高，没想到她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文，还会几句英文。想像不出，她那身极粗俗的打扮，红红的脸膛，明明是个饭馆的厨娘模样，可她说她是工程师。另一男士热情健

谈，是个司机。我们只好用俄语交谈。我又得折腾“人体语言”帮助自己，我声明我只是口语不好，其实我俄文极好，随后我念了一段书上的俄文，他们高兴地大叫：“莫斯科广播电台！”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开始问这问那，大谈友谊之情。他们说中国好，中国人好，不过对中国不了解，只知道有个北京，可我却一下说出那么多苏联的地名、人名，让他们很感动。那位司机当下掏出个本子记下了几句中文的发音，诸如您好、谢谢、再见、父母兄弟等等。然后一定要我写信给他，并说晚上火车到明斯克，下车去我家吧！去吧！我们全家会十分高兴的。他还是第一次跟中国人说话，看得出他是真挚的。我忙说我去莫斯科要尽快回北京，不能在明斯克下车。他问我，你这么年轻，一人出国，是干什么重要工作的？我说我是个编辑。这个词儿对他来说竟是如此陌生。编辑？做什么？我说在出版社，审读作家的书。那位女工程师说：“错误！”伴之一个大笔一抹的姿式。司机这下认真地端详起我来，我知道我这副样子决不会让人以为会大笔一抹改作家的错误。在苏联，作家的地位极高，他们一定会以为替作家改错的人比作家还要高明。我忙说：“对，是真的。”他伸出拇指说：“棒！”倒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似乎我是骗子。

说话间，我拿出在西德买的口香糖请大家吃。他们把糖拿在手中不吃，却细细地看，“啊，德国的！”像在欣赏什么艺术品。这使我想起车站上卖的苏联糖，一块有半两重，又大又粗，并不好吃。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他们问我中国有这样的糖吗？我点点头。好，他们又说。“中国副食品一定好多吧？我们太少了。”听了这话，再联想我在车站上吃的东西，

我心里有点惆怅。他们不该是这样，我又一次这样想。

车到明斯克，那位司机和我交换地址，等别人都走了，他送给我一把水果刀，“给我写信！”并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

在我们互道再见的那一刻，早有人不要命似地挤进车厢，接着是数不清的大包小裹源源不断地塞来，包厢中已是水泄不通。

这三个人看上去像农村妇女，高大、肥胖、浑身冒着热汗，气喘吁吁。她们穿得都是那么土气，长相不知为什么也是我见惯了的那种粗红脸膛，桶状腰身，头上包着很旧的围巾。到夜间她们全打起沉沉的呼噜，我简直无法入睡。自然没什么话好讲。真怪，我怎么就碰不上有些高雅气质的人？可我以前从他们的书上电影上却见到过那么多。不该是这样，我心里又说。或许这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区别？我知道我是个生活在艺术中的人，在生活中总吃败仗。生活和艺术对我来说早已互换了关系。我信奉劳伦斯的话：“艺术是真实的，生活是虚假的。”我可能又一次犯了错误。一个总把生活艺术化的人注定会在现实面前茫然。

我终于来到了莫斯科！

白俄罗斯车站。雅罗斯拉夫车站。列宁格勒车站。办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把行李存好，开始在莫斯科东奔西窜。

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我仿佛不是第一次来。我早就熟悉了她。不错，是书上、画报上的样子。

她雄伟、壮观。气势雄浑、威严的大厦（比北京的苏式建筑如军事博物馆、北京展览馆还要大得多，我们的似乎只是小模型）比比皆是，新式（西方式的）建筑林立，街道宽

阔，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广场，且多以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如高尔基广场、柴科夫斯基广场等等。名人雕塑矗立在街心花园中供游人瞻仰，几乎遍布全城。一座座古典俄式的大剧院或剧场令人流连忘返。

四月下旬的莫斯科，风已经变得很柔和，时时飘下温馨的雨，有时会来点中雨，不知不觉中那雨丝又变成了粗粗的雪糝，接着会抖起漫天的小白毛雪，但大多数时候天气是晴朗的。

阳光明媚的上午，我登上列宁山，在这里可以俯瞰莫斯科全景，背后是那座闻名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主楼，远远看去十分雄伟、气势夺人。可走近时却发现楼里传出悠扬的音乐声。一问才知密密麻麻的房间大部分作了学生宿舍。

列宁山下，宽广清澈的莫斯科河绕城而过，古老的建筑（红色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金黄顶的新处女墓、教堂、高耸入云的暗黄色的俄式大楼）和新式的乳白建筑交相辉映，气势恢宏。尽管是仲春，已见城中林木森森，绿化带连成一片，想必到夏天是个花的世界，绿的海洋。

在莫斯科最大的感受是她气度非凡，体态威严庞大。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她的色彩不够明朗，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那些俄式大建筑盖地铺天气派压抑，大一统的暗黄和尖顶有点单调。

如果你有时间走街串巷，就会发现那些中小街道与加里宁大街相差甚远。店面破旧，房屋容颜老损，街面失修，公共汽车上太脏、商店里品种太少、站大队的人太多……在这里徜徉，你会产生似曾相识甚至没有出国的感觉。我读特里

丰诺夫的城市小说时就有过是在读中国当代小说的感觉。

可是我的确是出国了，当上了在北京大街上被不少人羡慕的外国人。他们首先把你当成日本人。找你换美元，要洋货（洋烟、洋打火机、洋圆珠笔、照相机、羽绒服、牛仔裤、电子表、计算器统统在列）。他们愿出高价（七十卢布）买我同伴身上的羽绒服或牛仔装，非要他脱下来给他不可。有时你向警察问路，他会用英语问：“有烟吗？”我说我有很好的中国烟，他们笑笑，表示要美国的。

在红场对面最大的国营商场看看，那里的商品品种太少了，排大队的现象很严重。副食与家电产品尤其匮乏，家电产品质量不高价钱还很贵，一般收入的人难以应付。

在莫斯科吃饭难也是个问题。一般的饭馆太少了，几乎是让人寻它千百度才能偶然发现一个。这些馆子经营颇有方，一旦坐满了人，就关门，外面排上大队，出一个进一个，保持室内安静，为吃一顿饭得顶风冒雪好一阵子才行。弄得我许多次只好在冷饮店喝杯牛奶吃点面包点心拉倒。

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这几年我们改革后的长进，隐隐产生出点优越感；同是社会主义，我们比他们在吃上显阔。当然我也知道仅以吃的好坏论英雄是猪的哲学。他们住房交通等方面比我们强，还有许多我们赶不上的方面。

但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折磨着我，那就是：他们不应该这样。闹了半天，他们革命七十多年，世风还有这么不良的地方，他们强大了半天，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与他们强大的国威太不相称。

也许这样的观点太趋于实际，太不够高瞻远瞩，太不够